

导言 知识分子的根基*

布鲁斯·罗宾斯

在评论国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方面，美国行之有效的批判机制业已土崩瓦解。

——小威廉·F·巴克利（1959年）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非依附性知识分子已相对减少……这是知识日益体制化，特别是知识日益学院化的必然产物。

——刘易斯·科泽尔（1965年）

在第三世界中，知识分子往往都带有政治性。今天，对我们而言，现在最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或者说目前最为紧迫的问题，莫过于来自第三世界的教训。在这些国家中，“知识分子”这个特定的名称已逐渐消失，如同一种业已灭绝的物种的名称。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1986年）

各高等学府吸纳了几乎所有的知识活动，这标志着作为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知识分子”的衰落，尽管尚未完全

* 编者感谢拉特哥斯大学研究基金会托管委员会为该书出版提供的帮助。——原书注

湮没。

——让·贝特克·埃尔席泰（1987年）

里根和布什政府中的右派人士已作出了一项社会公益服务的举措。

1984年，美国前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在其《要求收回遗产》一书中开始反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教育和文化领域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同年，《社会文本》杂志利用由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没有辩护的60年代》描述了这种种变化，并为此作了辩护。1987年随着E·D·赫希的《文化知识》及艾伦·布卢姆的《封闭的美国心智》^①登上畅销书之列，右派近十年的“妖魔化”本性已尽人皆知。自此以后，其攻击也继续升级，然而，其结果却是自相矛盾的。显然，这些文化保守分子希望通过将这场辩论从个人职业和个人规训提升至“公共领域”来赢得足够的公众和政府的支持，并以此来重新控制这一越来越脱离世俗传统束缚的文化领域。与此相反的是，他们却轻率地把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的这场运动中所逐渐赢得的支持公之于众，即便是对那些曾经存有疑虑（甚至现在仍有疑虑）的人。右派不断地严厉指责左派给美国教育文化机构带来的影响，同时希望唤起人们对这种影响在基本前提和体制结局方面是否正常的注意。充分考虑到这些文化保守分子对训诫夸张的偏爱，右派清楚地表明，根据所谓的B氏三杀手（玛丽·刘易斯·普拉特所指的贝内特 [Bennett]、布卢姆 [Bloom] 以及索尔·贝娄 [Bellow]）整理出的广泛意见的综合，该新中心在很大程度上都是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活动的一个产物。

由于里根政府对此反应强烈，广大公众都意识到，无论好坏，左派是美国文化生活中一支力量强劲的队伍。更出乎意料

的是左派自身亦对此一清二楚——它已习惯于纯边缘文化既严肃又活泼的舒适，习惯于业已被剥夺但毕竟仍存有的略显夸张的自我形象 内心放逐、异化、超然而自在的反抗。面对右派的攻击，产生了某些无可辩驳的事实——某些明显扎根于现实的事物，某些业已实现或获取的事物——这些事实成为右派攻击而左派维护的焦点。这一广大公众的共识 尽管是批评的 却迫使左派知识分子承认其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他们的文化与体制的成就。

正是这个奇异而又未被人们广泛意识到的未竟成功故事，将知识分子的话题重新摆上了议事日程。

由前文中的引文可以看出，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均赞同并大肆宣扬知识分子已不复存在的观点。这种扰乱人心的共识却对这一多义的标题“知识分子的根基”提供了注解。在 20 世纪 20 年代，卡尔·曼海姆以“自由漂浮的”、“非依附性的”^②来描绘知识分子，从这种意义上来看，现在的知识分子已经搁浅了。几乎人人都认为 当今知识分子 或者说为数大大减少的一点残存的知识分子，都前所未有的地被束缚于公共机构的环境中。诺曼·波德霍雷茨于 20 世纪 60 年代曾代表右派谴责社会上知识分子消亡这一现象 他说：“自憎的表现形式是否定 与其说否定他们是谁，不如说否定他们在干什么。成为一名知识分子——一名学者，一名思想家，一名艺术家 或一名作家——并不表明成功 即使‘创作了传世文学杰作’亦不可谓成功。知识分子应该去改造这个世界。”^③另一方面 艾伦·沃尔德认为 成为独立的“批判思想家”的意识形态 更确切地说 超越意识形态本身的盲目控制的知识分子，这仅仅掩盖了纽约派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向右派效忠的转变。^④为了改造世界 知识分子的理想目标 就是必须如左派人士沃尔德指出的那样：“高度参与（‘萨特

语)或“有机地”(葛兰西语)而不是带着批判的心理保持自我的独立。^⑤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扎根于社会群体、社会事业以及社会运动。然而事实上,左派往往谴责知识分子过分顺利地扎根于现实——学术工作和职业、妥协性的机构、“背叛”以及“名额增选”等谴责他们改变自己来适应社会。

换句话说 知识分子的根基不再遭到质疑 这为进一步的辩论和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共同基础。

问题在于知识分子的根基由什么构成?它究竟有何种价值和作用?如何从伦理上和政治上来区别这些有关知识分子根基的事实?“扎根”这个动词包含逻辑上对立而历史上并存的两层意思:(1)使束缚、局限于一定范围,限制其行动;(2)使建基、建立,充当奠基石。无论是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还是福柯^⑥的“专家”知识分子的概念——这一问题将在本书 R·雷德克里斯南的论文中加以讨论——都确认“扎根”在第二层意思上的模式(延续并重叠而非对立)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这场辩论必须基于这样一个前提 即知识分子可以同时在这两层意义中“扎根”。辩论的焦点并非仅仅是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遗产 更多的是60年代的知识分子所采取的体制形式 有多少得到了保留 什么东西被改变了 出现了什么样的可能性 还有什么必须予以剔除。为了引发这场辩论 本书的撰稿者已认识到“权力中的知识分子”这一提法(亦即保罗·波尔最近一部著作的标题)显然不再显得自相矛盾。^⑦他们开始注意具体环境中实施的权力以及由具体环境界定的权力,这是一种政治和道德上模棱两可的权力,也是一种自B氏们(贝内特、布卢姆、贝娄)反击以来一直处于险境的权力。这些文章致力于探求知识分子的具体社会地位、现状及“实例”分析知识分子所“依附”(爱德华·萨义德常用的一个中性词)^⑧

的实际机构以及这种依附关系的政治价值，竭力辨明哪些是促使其发展的条件，哪些属于限制性条件。

更具体地说 不管是什么主题 这些文章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评述。人们普遍认为左派知识分子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均扎根于美国的教育文化机构是其一大成功，但他们却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这恰恰是一种“失败”，一种背叛，一种衰落，甚至是知识分子的湮没。最具代表性的此类作品当推拉塞尔·雅各比的《最后的知识分子：学术时代的美国文化》。^⑨在一场辩论中 雅各比与艾伦·布卢姆的观点针锋相对，这一观点现已刊登在专门登载知识分子文章的期刊《欧亚杂谈》（1986 年春夏号）和《泰勒斯》（批判思想季刊，1987 年春季号）的知识分子专刊上。雅各比在文中谴责“学院马克思主义”的兴起 即左派知识分子为学术、职业和专业所同化 而这又剥夺了知识分子本身具有的公众角色和抗衡力量。“为知识读者写作的独立知识分子正在消亡。”（第 6 页）“如今非学院知识分子正成为濒危物种。”（第 7 页）至 20 世纪 60 年代高等学府实际上已垄断了知识分子的工作。”（第 8 页）

以上论述 阿尔方斯·泽尔纳在叙述法兰克福学派从军事情报局过渡到学院的报告中以不同的语气多次提到该论述）所体现出的怀疑主义态度的一个原因，其实是蕴涵于该书题目中的一个时代性讽喻。“最后的”知识分子因未能重塑自己 只能聚集于纽约派知识分子的周围，虽然并不局限于纽约派知识分子 而且 未能承先启后的“迷失的一代”正是指 60 年代的一代。正如林恩·加拉福拉所指出的，雅各比对于纽约派知识分子的称颂 忽视了他们在 60 年代种种行为的不良记录——谴责反文化 痛斥新左派 以及哀悼女性主义。如若纽约派知识分子后继乏人 那将是他们自己的过错。^⑩现在称颂他们无异于

重蹈他们 60 年代的覆辙。更重要的是，这一家庭戏剧引出了雅各比两个似乎合理但概念相反的潜在含义：“公众的”和“学院的”。沃尔德特别提到菲力普·拉夫已证实了作为角色模型的异化现代主义者成为异己知识分子的事实，这一证实使其不可能参与或支持 20 世纪 60 年代的反文化，也不可能公正地评价“黑人、奇卡诺人、印第安人（第 221 页）的新文献的价值。黑人、奇卡诺人、印第安人甚至妇女——他们在美国各大高校、课程设置、会议、图书目录等方面的新兴代表对 60 年代的反文化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并不属于“公众”知识分子。纽约派知识分子就像许多赞同抽象主义的人一样，他们认为“公众知识分子”并不能由具体的名称、人物和地点来表示。一旦有人特意站出来要求成为“公众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这种表征的合法性却缺乏必需的佚名文献的支持并因其大胆鲁莽而受到严厉谴责。这便意味着，在雅各比看来，“公众的”一词实际上可以恰恰相反地被解释为“异化的”或者“边缘的”，不受社会具体环境的制约。这一混乱出现在其文中第一页的前言部分，他痛惜地说：“美国几乎没有知识分子‘离群索居’。”^①“离群索居”，他在同一页上指出这意味着“公众文化的匮乏”。要有“公众性”就要离群索居，没有渊源，没有根基，漂泊在社会这个包罗万象、纷繁复杂、形形色色的万花筒里。使用这个伦理道德含量甚重的“公众知识分子”一词，雅各比实际上却是在保护一种旧有的、缺乏道德可信度的知识分子特有的自由漂浮的独立性。

持怀疑态度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曾多次听到的雅各比关于知识分子衰落的各种评述。譬如说，雅各比一方面认为“知识分子越来越学院化，他们无须再创作公众性散文，其实他们不曾创作，也不会创作”（第 7 页）；另一方面，他也提出其他

一些既具有启示性又目光短浅的观点，阐述了什么将会给“公众”带来最终的影响。如在 1919 年布达佩斯的一群哲学家对格奥尔格·卢卡奇及其“周日界”所作出的回应：“我们只要求他们一件事：要求他们更注重以优美准确的匈牙利语将事情表达清楚。例如，他们为何老是提及‘著作’一词，如若在匈牙利语中没有表达这一概念的词汇，那么用匈牙利语来阐发这一概念将无异于浪费时间。”同年，卢卡奇开始关注新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的文化问题。在最严厉的评论家眼里，他确实够“公众化”了吗？

雅各比引用了欧文·豪于 1954 年对莱昂内尔·特里林的一段抨击，其中指出知识分子融入大学将意味着“他们不仅丧失了其传统的叛逆特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不能成其为知识分子”（第 82 页），但十年之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提到豪时却尊敬地称其为“豪教授”。随着对知识分子地位“每况愈下”的指责日益高涨，问题亦显得越发清晰，附加于知识分子身上的两个形容词“公众的”和“独立的”并非指其曾经享有过的集体普遍性和个人自主性，而是一种用来攻击个人的独特性及依赖性，同时又掩盖了指责人员本身的措辞工具。大学只是这一长串机构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类型，它带给人们无数的惊喜，而知识分子亦扎根于此，他们受其限制或被其吸纳，并赖以生存。如同雅各比的评述，关于知识分子行将消亡的说法始终存在，其原因就是知识分子实际上并未如别人常说的那样享受此种美好、独立自由的生活，因而对其进行深入观察时，很明显，他们始终是在不断地失去这种独立和自由。

萨特曾给知识分子作了下述界定：“知识分子总是关注与自己无关的事情。”（第 12 页）这种说法其实是自相矛盾的。使某事成为自己的事情，无论从谋生的角度来说，虽然“事情”一词

在其法语原义中并未暗含“谋生”之意)还是将其看作是付诸时间与精力的事业,都是自相矛盾地否认这种活动是你作为知识分子这一同一性的基础。可以说“生意”只是知识分子闲暇从事的业余爱好,仅仅是在其他事务之外稍稍触及,随手带过。萨特呼吁“高度参与”这是人人知晓的,可这纯粹是另一回事。萨特必须执着于热情和道义的自愿主义,以使知识分子再次依附于社会。原因极其简单,因为他在界定中假设知识分子原本与社会是分离的。事实上,有人也许会认为这些说法没有事实根据,只能束之高阁。例如朱利安·邦达在其1927年出版的《知识分子的背叛》^⑫一书中不断地运用隐喻和例证阐述自己的观点,认为这并非是背叛世俗而是对知识本质的确认。根据弗朗西斯·马尔赫恩对邦达作品的注释,一名知识分子应以人类无私服务的名义参与超凡地摈弃所有民族派系及社会党派偏见的活动。^⑬那么,一旦知识分子的思想被打上社会烙印(我下面就谈论性别问题)就必须始终与社会思想背道而驰。正是在这背道而驰的时刻——亦即“扎根”的时刻——这一主题便产生了。

将知识分子与政治、国家、革命、改革、现代化相联系的书名,均试图与政治不合拍,以引人注目,但无不以失败而告终。知识分子与政治的这种不合拍,只是一厢情愿,演变成为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紧密联系。如果你在一座像样的图书馆作一次调查,就会发现几乎所有关于知识分子的书名均会涉及政治、国家、制度、革命等等。其实这并不难理解。“知识分子”这一术语在“德雷福斯事件”时期便被广泛使用,并具有政治和职业两层色彩。齐格蒙特·鲍曼指出:“这一术语产生时,哲学家或共和国知识分子的子孙后代已根据他们狭隘的兴趣和关注的范围分裂成几个小型的专业领域。因此这一术语吹响了重整旗鼓的

号角，回荡在警戒严密的职业和艺术前线上空：呼吁人们恢复‘知识人士’的传统（或使集体成为现实）使其体现并实践真理、道德价值观和审美判断的统一。^⑭不妨说 其意图就是一种宣传行为。（第 23 页）

作为一种政治措辞，而非一种我们业已沿袭的理想的过去，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应以措辞的标准来评判。如雅各比所作的措辞性评论 从非严格意义上来说表达的是一种哀史 而非讣告 它们谴责知识分子的没落和消亡 同时也指出存在着使道德复苏的可能，并且为道德复苏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关于这种哀史 之所以存在着困惑 是因为其粗俗 萨克凡·贝尔科维奇在其关于这一主题的书中作了详细的探讨。^⑮在谴责知识分子没落的同时，他认为他们已放弃了他们所应承担并应不懈追求的一项崇高使命 即他们合法的正当的使命。同时 他甚至因一些完全超越知识分子能力的事而对知识分子横加指责——有一次即使雅各比亦不得不讷讷地承认“公众知识分子的消亡正是公众自身调整的结果”（第 236 页）。他认为知识分子有着强大的潜在能力去改变整个社会。可是，如安德鲁·罗斯在其文章中所问的 知识分子真可以称得上“反叛的一族”吗 如何来评判那些不担负使命的人？虽然雅各比不愿评判外国学者，那么他又应如何来评判乔治·罗斯所谓的“现代法国左派知识分子的没落”^⑯，而这个国家明显是社会主义政府而非共和国政府控制着“公共领域”？难道这种哀史与美国（或法国）例外论（exceptionalism）的傲慢没有关联吗？

从政治的角度讲 以‘自主性’知识分子为名义的哀史正在寻求一种不可实现的纯粹主义（purism）或派别纯粹主义。而对于‘公众’知识分子的哀史则是呼吁一种集中性 而这只能通过消除政治左派来获得政治上的集中。雅各比所列的一系列英雄

使这一倾向极其醒目。他所谓的“迷失的一代”主要是由女性、工人阶级、黑人、西班牙人后裔以及并不代表以前的白人、男人、中上层阶级知识分子的其他群体组成（对许多纽约派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背景不应予以隐瞒）。雅各比所理想化的许多人物均天生以他一贯理想化的“公众”姿态出现。结果，他所赞赏的“公众”人物比他所排斥的人物往往更接近于美国的主流社会——换句话说，与美国的统治阶级和集团组成有机整体，或者说更趋近于右派。然而忽视后者的错误——以“公众”来掩盖右派和主流政治——也将掉入前者错误的陷阱，即纯粹派对权力的挑剔。因而有必要探讨其根基的模糊性，具体界定实施权力的可能性及其范围——如乔纳森·艾拉克处理麦考利事例的做法——而不至于陷入对这两种简单对立的哀史之中。

扎根于大学并非知识分子的背叛、妥协或为了增选名额，产生这种想法的最主要原因是性别。讨论知识分子中性性别的话题犹如讨论职业足球运动一般。刘易斯·科泽尔关于这一主题的《观念的人》^{①7}一书（再版于1970年）是记录历史的最具典型性的一个例子。而在1987年出版的三部最新选集中，加农的编著包括12位撰稿人，其中1位为女性作者，艾尔曼、斯凡森和索德奎斯特在他们的选集中选录了13位作者的稿件，其中也只有1位女性作者，而墨汉恩的选集中根本没有女性作家的作品。^{①8}（本书虽说有迪尔德丽·戴维、加亚特利·斯皮瓦克、芭芭拉·埃伦赖希等女性作家的作品，却无一例外，未能达到足够的中性原则。）如果妇女未被邀请参与有关知识分子的讨论活动，她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自己并未从讨论中得到任何的裨益。一场以理想的未受约束的普遍性以及独立和没有具体表现的知识分子（邦达明确指出知识分子的超验使命不包括婚姻与家庭）为中心的讨论，将极易占据男性的幻想世界。因而从另一

方面来看，从知识分子的根基出发，承认知识分子的各种关系团体及其境遇，这是使知识分子话语丧失男性特征并促使妇女参与知识分子讨论的一个必要步骤。

同样必须承认的是自 60 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特别是女性知识分子在大学中逐渐赢得了一席之地必须承认这是一大成就。在性别政治里来自左派和右派的对于当代学院‘公众’程度不充分的攻击必须毫无偏见地看作摧毁女性主义者业已取得的具体成就（虽然还很脆弱）的隐蔽手段。这种攻击来自右派还可以理解而于其他人却是不应该的。正如对妇女来说跨出家门进入劳动力市场（更不用说进入由诸多社会活动内容所决定的学院亦非意味着沿着‘公众’方向迈出了一小步。即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职业化也总是既有下层人民的功绩也有上层人士的让贤选拔。如果你贬低所有的政治业绩（以严格的纯学院式的名义）结果无论学院内外你将均不可能取得此类成就甚至也见不到此类成就。

承认大学在两层意义上作为知识分子的‘根基’的做法，一方面为知识分子发展提供机遇，另一方面又限制了知识分子的活动。接受这种观点并不意味着从文化保守派的“衰落论”迅疾地转向“新阶级的理论派”如丹尼尔·贝尔、艾尔文·古德纳、伊万·塞莱尼的“崛起”论。^{①9}贝尔宣称“大学已不可避免地进入了社会舞台的中心”（第 3 页）这其实是一种夸大但有这种想法的也并非他一个。另一些新阶级的理论家亦认为大学的扩展和强大将意味着一个社会权力的大转移，同时“知识分子将可能上升至现代社会的主宰地位”。西方社会国家和‘公共事业’的膨胀以及东方国家社会主义政体的稳定发展已强化了使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概念化的新尝试。国家舆论渠道的宽畅和扩张将为东方社会主义社会和西方资本主义社

会的新型统治阶级提供政治基础。(艾尔曼等编著 第 5 卷)

我认为 应将芭芭拉·艾伦赖希与约翰·艾伦赖希的开创性文章“职业管理阶级”^②中所阐发的观点与右派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自大自满和左派的幼稚盲目的乐观区分开来。给这一思想以灵感的努力,以及进行其所激发的争论的一切努力,均是将业已存在的一种抵触行为理论化:即 60 年代的学生造反。这个问题并非意味着如何将知识分子引入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 更不是将知识分子看作代替工人阶级的革命阶级 而应该是当学生和异己思想占据社会权威政治领域后,应该如何理解其职业性异议的不同类型和局限。因此 最好对“阶级”一词作广义的理解 时刻提醒人们 仅凭对知识分子的真实描述 无论是恭维还是贬损 对说明这一问题都毫无用处 真正起作用的是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的关系。虽然新的社会环境和体制使用了一系列整体化的、互相矛盾的、令人难以信服的名称——简单地列举几个 如“后工业化国家”、“专家政治”、“平庸政治”、“消费主义”、“服务经济”、“信息社会”——从这一系列的政治陷阱和政治切口来看,即便是这些滥用的意识形态词语亦无法阻止我们探寻知识分子究竟经历了多少社会变化来转变他们的价值、功能及抵抗潜能等问题。本书中斯坦利·阿罗诺维茨的文章和对芭芭拉·埃伦赖希的访谈进一步探讨了这一论题。

在此需要防范的是 承认了这些根基 却又掉入了另一种衰落论的陷阱。近来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雷吉斯·德布雷的《法国掌权知识分子》。^③在美国,最重要的例子就是理查德·怀特曼·福克斯和 T·J·杰克逊·利尔斯根据“消费保护主义”的思想对于职业管理阶级或阶层的“崛起”的解读——亦即真正民主的兴衰。^④福克斯和利尔斯认为,知识分子在 19 世纪末就

开始提供“职业咨询 营销策略 政府项目 选举决策 以及广告商的合适形象”等服务(第 xii 页)。然而,在出卖自己创造力和专业技术的同时,他们亦在为他人推销产品和服务,通过“改良”的方式来消除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最重要的是“努力创造只有知识分子才能实现的需求”(第 xiv 页)。他们的服务左右了服务接受者的选择,削弱了他们的自主性。具体说来,“他们宣扬一种新道德观,把‘超验思想’的旧目标融入自我实现、直觉满足的新理想,在‘治疗学世界观’内都冠以‘解放’的口号。”“专家领导和普遍的自私自利思想在美国的消费文化中同步发展,齐头并进。”(第 xii 页)。这一结果便导致了“自主性自我的衰退”和“非真实感的产生”(第 9 页)。

若以此来代表左派的普遍观点,那将是一大遗憾。这一论述产生了一系列用以取代“现实”的职业性标志和符号,同时个人的“经历”被用来换取“亏失”他人的“专业知识”。该论述虚设了一个无须符号和标志的预制现实,这是一个完全占有自身经历的预制(自立的)自我。此论述的目的在于判定一切的知识 and 艺术的活动对原本具有“自主性”的公众而言,都或多或少是多余的、堕落的和“非民主”的无理要求,因为这些公众不需要任何的建议、任何形象及任何艺术。这些公众无所需求,那么就无法完全实现自己的抱负。然而,知识分子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却远非这一粗糙的反论所能描述,它显得更微妙、更复杂。当然,人人均可以对这一“治疗学世界观”持异议,而不至于陷入一方得益另一方受损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知识分子只能通过掠取民主公众的自主性来获得自己相对的自主性。当然,使知识分子——如理论家、改革家、医学家、广告商、揭丑作家等——产生驱动力的自身利益,自然不会等同于也不会相反于接受其形象及建议的服务对象的自身利益。现在正在发生的事

情并不像摩尼教徒那样疯狂 无论好坏 曾被人们称为‘自然’或‘第二自然’的社会习俗正演绎着新的意识 新的途径 新的选择。以此为已任的知识分子因而必须获取新的意义和新的权威。然而 所有的左派人士 尽管对这种权威存有疑虑 均不愿让我们回复到知识分子可有可无的年代。

柏拉图把诗人从他的理想国中放逐出去不啻是件类似的事件，就如职业管理阶级对创造符号及标志的抗议所表明的那样。另一类如‘治疗学世界观’或‘消费主义’等显示知识分子重要性的词语体现了社会的审美化。新阶级理论很好地区分了实用主义领域 旧势力掌权 和象征领域 知识分子行使一种新的权力，虽然反对意见极其脆弱——是否曾经存在过没有象征的实体呢？——但它确实突出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即知识分子日渐增长的重要性和斯图亚特·霍尔所谓的“美学对于日常生活的渗透”^②。“文化即使曾经是，现在也不再是生产与物质这‘艰难世界’的点缀品 也不是物质世界这块蛋糕上的奶油。该词如今与世界一词一样带有‘物质性’。通过设计、技术及时尚，‘美学’早已渗透进了现代生产领域 通过营销、包装及款式，‘形象’提供了现代消费极为依赖的主体表征模式。”（第 25 页）这一现代革命深刻的文化特征 解释了《社会文本》之类的期刊为何能够长盛不衰，纽约派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义为何能够与文艺现代主义紧密结合，以及本书为何有如此多的撰稿人，（除三人之外）他们全是文学评论家 还从事其他工作）另一方面 文艺批评必须发出这种呼吁 这当然不能成为赋予他们的舆论以任何特殊权威的理由。“文学性”和知识分子传统的“自主性”之间一直存在着混淆 两者都成了边缘性的典型 要求实现理想的统一，反对实际的分离。因而曼海姆在布达佩斯的谈话中发展了其自由漂泊的知识分子的概念，而卢卡奇惟一感兴

趣的则是他独领风骚的唯美主义思想 这绝非偶然。然而 这一混淆虽有助于解释评论家迷恋于此的原因，但同时还留下了许多继续探讨知识分子的话题。

认为知识分子“太文学化”的观点就反映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著作《知识分子的消亡》里^{②4} 它宣布了后结构主义风格的灭亡。随着排斥普遍性主张的后现代时期的到来以及后结构主义风格的消亡 如利奥塔所说 知识分子及其反对作用已为艺术和艺术家所取代，而它们的竞争又仅仅局限于一定的范围，这种低调有时很难从其表面来衡量。福柯认为边沁的“全景式监狱”象征了一个完全实行行政管理的社会 象征了身处其中的‘普通知识分子’不公平特权的压迫观 同时福柯还人人皆知地希望过上隐姓埋名的生活，即在他所设想的社会里能够实现的一种状态，只能在全景式监狱的监视塔中悄悄观察到。福柯这一措辞手法的成功或许更应归功于这一继续富有想象魅力的状态——传统知识分子的状态——以及我们对于干扰性监视的恐惧。

后结构主义怀疑知识分子的代表性，这种怀疑反映了目前思想中文学政治‘表征’的普遍危机 但绝对有助于限制隐藏于“责任”这一措词中狂妄的自我主张 而这便是业已提及的一种哀史。吉姆·梅罗德在其《评论家的政治责任》一书中写道：“课堂的市侩之气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加有力地反驳了（如果不是否认）一种可能性 即评论活动是 或许是）一种致力于划分世界结构并改变其结构的人类力量。”^{②5}这是一种重复或妄想。我们都希望自己有所作为 若有必要 我们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事业 使自己更有作为。但是 当知识分子要领导世界进行变革这种奇异独特的思想悄悄潜入，促使他们呼吁知识分子的责任的时候，一种卑微的带有禁欲主义特征的反表征局部论却获得

了隐性的美德 保罗·波尔在其《权力中的知识分子》一书中竭力褒扬了这种反表征。因而，坦率的自私自利要远远胜过虚伪地滥用一种遥远或假想的体制。

然而这并不是说 知识分子所有合法的努力应看作伪善和自大而被抛弃。就像利奥塔一样 保罗·皮科内也认为在后现代时期知识分子已无须合法化。“随着新政大社会模式的崩溃，‘公众’知识分子已转向了社会地位稳定的职业知识分子，无须‘公开’曝光更无须要有正当理由去充当官僚学术团体之外的更广泛的社会角色。^{②4}相反 吉姆·梅罗德则认为：“最能界定当今人文科学的是批判性权威与知识分子合法性的激烈竞争。”（第 198 页）在对布卢姆·贝内特及其拥护者进行批评攻击之后，梅罗德无论是在人性内部还是在与外部公众的（内在化的）对话中，均似乎更接近于真理。这是一场决定鹿死谁手的竞争。于尔根·哈贝马斯极力支持并努力解释合法这一词语的涵义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公共’知识分子活生生的典型。他在德国“历史潮流”对纳粹进行修正主义解读时扮演了一个可敬的公共角色。在这场辩论中，学术性历史学家事实上一方面向纳粹道歉，一方面坚持认为哈贝马斯作为一名纯粹的哲学家缺乏必备的专业知识。然而，他们有力而古怪的论据便是一种后结构主义：在非学术性公众面前怀疑一切合法的要求。正如约翰·托毕写道 德国新保守主义者认为‘一个知识分子‘新阶级’正用‘口头与书面两种语言的力量’（熊彼特语）来获取更大的社会奖励和荣誉。这一自满的‘新阶级’据称提出过崇高的合理的全民社会福利计划，而其实却是以扩大政府部门来掩盖其私欲。于是知识分子便将其能力转化，用来服务于政治和经济目的。^{②7}至少对于那些支持哈贝马斯反对修正主义史学家的人们来说，这将为知识分子不应抛弃寻求合法化的努力的观点

提供理据。对于右派来说 寻求合法化是再容易不过的了 同时又可以对手贬斥为一群特殊的自私自利的局外人。现今美国右派的活动再次给予我们一次深刻的教训。

康纳·克鲁斯·奥布赖恩因误导而不慎介入南非政治，这一情况已由约翰·希金斯在本书中进行了探讨，奥布赖恩最近写道：“这个国家的最大优点 就是我所碰到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觉得只要不卷入政治运动 他们就会生活得很满足。如果大多数读者像我一样马上确认这一陈述错误的话，那么这又一次印证了这一点 知识分子对合法性的要求并未终止 如同结束本导言一样 我个人的观点并未终结。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 文化遗产的继承——对知识分子合理活动最有力、最保守的界定——目前并不足以在美国知识分子中产生‘满足的生活’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恰恰与韦伯相反——既远离思想而生存，又为了思想而生存。或者因为（同一种说法）‘异化’，该词曾经用来界定对抗性知识分子，现在倒概括了知识分子的整体状况。（这一少数群体的普及化，除去知识分子先前的荣耀 或许正解释了为何当今知识分子开始承认自己的‘根基’。）无论如何 在某种水平上 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在其职业内部 而非职业外部 的重新定位 是其在根基上的一大进步 也是他们不丧失政治连贯性而获取职业性“满足生活”的道德要求。对某些人来说 这些要求或许显得荒唐甚至是堕落的 然而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知识分子”这一术语并非对于一种业已存在的种类的描述 而是‘一种广泛开放式的邀请’^②。如果现今没有一个群体能够将各种不同的职业联合于一个普遍的对立性 那么这话题仍值得讨论 因为在某种新的措辞里，“邀请”的意义依然值得延伸。如果知识分子是政治想象的人物，一种与各种政治言论难以分离的人物，扎根于各种接连不断的对抗性